

习近平文化思想
学习专刊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

——105年来党领导文艺的宝贵经验

□王兆胜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党始终坚持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并积累了独特的成功经验。今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需要对这些实践和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更好地推动新时代文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思想灵魂的,这在文艺上有集中体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才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人民立场,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领导文艺,并不是生搬硬套,更不会固守僵化的教条,而是探索出一条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之一,它在新时代文艺发展中具有定盘星和压舱石的作用。

二是突出思想与精神的引领,确保文艺工作的高标准与高质量。在文艺工作中,思想与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没有思想与精神的高标,再精致的艺术也是缺钙的、没有风骨的。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过硬的思想和昂扬的精神,带领人民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文艺工作上,新思想、新观念、新精神、新境界等也一直得到充分的重视,并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如瞿秋白评价鲁迅时,就是从思想的形成、发展、特征等方面进行概括的,也充分肯定其战斗精神。赵树理被称为继鲁迅之后真正理解农民的作家。赵树理说过:“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这样的农民本位与个性表达是很难得的,也是有思想境界与精神高度的。当前,党和国家将“新大众文艺”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在新时代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充分肯定与有力推进,也希望这些创作更具思想深度与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此同时,党在领导文艺的过程中鼓励积极进步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真正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聪明才智。

■书评

留住文学批评的“灵光”

——评陈劲松《AI时代的文学回响》

□苏沙丽

“在时代里创作,从文学中寻美”,此乃陈劲松的文学理想,也是其评论集《我们的时代及其文学》《寻美的批评》共同传递的批评精神。这种理想与精神,在其评论新著《AI时代的文学回响》里得以延续深化。作者试图从变幻莫测的时代洪流中,廓清文艺创作的常道与变迁。一脉相承的追问之下,凭借的依然是鲜活而体己的个人审美经验,虽不一定具备指点江山的气势,却犹如细水长流般汨汨流淌,蕴藏着一股深情与韧劲。

谈罢《AI时代的文学回响》,我认为其最鲜明的特征是,作者以开阔的批评视野对文学遭遇科技的大变局进行敏锐体察,并构建起个人独特的观察视角。文学大变局的重要因由,源自近年来AI(人工智能)写作的勃兴。身为高校教师和批评写作者,陈劲松并未简单地担忧它们的“风生水起”会给大学教育或文艺创作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是在日常教学与批评实践中,通过多种尝试发现其弊端,认识到其难以替代人类写作之处。譬如,课堂上先让学生充分大胆地使用AI写作,然后比较AI写作与人类写作的差异,自然可以看到AI在条理清晰、主题明确之外,还有其无法抵达的精神细节。又譬如,在关于文学的阅读与对话中,AI写作仍无法获取并呈现出足够的深度、创造性与想象力。在陈劲松看来,好的文学作品除了语言,还离不开情感、想象力及人类经验。与此同时,他意识到人机协同写作似乎已经无法阻挡,已有不少高校出台各种“AI+写作”的教学举措。以他的理解,“最值得担忧的并非AI可以写作,而是AI正在改变人类的阅读习惯和写作方式。因此,人类创作者须尽早走出

三是内行人领导文艺,与文艺工作者心气相通。党领导文艺,领导者多是内行,且在文艺领域有名气、声望、号召力,从而不断推动文艺工作的顺利开展,实行良性互动。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其《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是经典报告文学作品,这就容易理解他为何能与鲁迅心气相通,真能读懂鲁迅,并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文章大家、诗词高手,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开创者,所以,他能够提出文艺为大众服务,提出“双百方针”,并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全新局面。其他领导者也非常熟悉文艺、重视文艺。譬如,据巴金回忆,他两次参加文艺工作者会议,都坐在后排,周恩来总理没看到他,就拿名单询问巴金来了没有。对此,巴金非常感动,他说,那天“我从中南海出来,凌晨的寒气使我感到一阵冷,可是我心里却十分暖和,好像看见了几小时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阳”。习近平总书记熟悉文史,对文艺情有独钟,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后续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艺精准把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旗帜。我们党的领袖懂文艺、爱文艺、敬重文艺工作者,其领导力就大为不同。

四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让社会主义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就是人民性。简言之,文艺来自人民、由人民创造,文艺为了人民,要把人民的评价作为核心衡量标准。纵观100多年来党领导文艺的实践,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不断强化文艺的人民性,激活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自主性、创造性。具体说来,文艺创作源于生活,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譬如,鲁迅的《故乡》《朝花夕拾》等作品,都是基于他的生活经历、人生感受、生命体验,所以才能写得形象生动、活灵活现。文艺着力表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其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所盼所愿。赵树理、柳青笔下的人物,不论是旧派的还是属于新人,都是以广大农民为表现主体,可谓深入生命根本的灵魂透视。文艺的受众是人民,表现方式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路遥作品之所以得到千千万万读者喜爱,特别是奋斗的年轻人热爱,这主要的原因是作品所描写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点燃了普通人的心。当下的新大众文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以鲜活且带有泥土气息的语言直接表现自己的生活。通过不断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性,我们可以创作更多的作品折射出时代的光华。

五是让文艺在实践中放光,特别是在党领导人民获得真正觉醒的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过去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新文学不是启蒙压倒救亡,就

是救亡压倒启蒙。事实上,启蒙与救亡并不矛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过程中更是如此。以抗战文艺为例,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启蒙与救亡形成的双向互动,在唤醒广大民众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当时,将国家民族历史重任担在肩头的知识分子,怀揣着“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追求与理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其中,有直奔延安的,有到其他解放区的,有在国统区的,还有深入敌占区的,他们用文艺武器发挥了鼓动群众的巨大作用。如20世纪30年代,由黄敬、王林等人在山东青岛成立的海鸥剧社,在地下党领导下,他们奔赴各地演出文艺节目,足迹所至均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喜爱,产生很大影响。还有“好一计鞭子”等作品,作为当年涌现的优秀作品,照亮了一个时代。新时代以来,文化下乡、文艺下乡成为风气,这也是党领导文艺的传统的发扬光大。如果说党领导文艺有何独特之处,那就是让文艺下乡,到人民群众中去,在创作者与受众之间形成双向互动,从而真正发挥文艺的再创造功能,以便激活、推动、创新文艺发展。

当前,党领导文艺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最主要的是高科技条件下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带来的文艺变革。这种变革改变了以往文艺的生产方式、制度管理模式、评价欣赏体系,原来的纵向性发展变成横向多元的综合性凝聚。在新媒介加持下,文艺作品从创作到完成再到成为欣赏对象,一改过去的长时段复杂程序,甚至作者可即时与读者达成共识,受众还可同屏发表评论,开集体在线与同屏共创的全新局面。面对这些新的文艺格局,我们如果对新媒介的生成、传播、影响不够熟悉,就无法真正与新时代文艺现场产生共鸣。基于此,需要不断更新我们的工作方式:其一,要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科技与新媒介的特性与力量,决不能让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过去。其二,真正与新时代新文艺保持同频共振,深刻理解新媒介下文艺的生成、发展、运行规律。其三,由原来的高位与错位看待文艺,变为以更平等、平和、平衡的心态参与文艺现场,提升对文艺现场的把握能力。其四,让传统的艺术经典标准变得更加包容、兼容、通融,特别是要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其五,引领新大众文艺吸取传统文艺的优长,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文艺经典,以彰显中国文化特色与中国文艺气派。

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时代中国文艺正面临崭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以更积极进取的心态应对,在总结以往党领导文艺的宝贵经验基础上再创辉煌业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南昌大学特聘教授)

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主办

传统的文艺研究通常将文艺生产等同于创作者的个体创作活动,将文艺作品的诞生只是归因于创作者的天赋、阅历与情感表达;而事实上,完整的文艺生产活动是一套社会化、体系化特征明显的复杂流程,在创作者背后,还有期刊编辑、出版人、评论家、组织者等环节的相互协作、合力推动。因此,整体来看,真正的文艺生产,必然要依托完整的文艺场域运作体系。这种场域内部协同运作的过程在新的媒介语境下,变得更加现实和迫切。通过创作者、出版机构、评论群体、传播平台的多方参与、相互配合,文艺作品实现价值转化、传播普及,才能真正进入到读者的接受视域,完成从写作到接受的完整流程。

笔者自2021年7月起担任北京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志愿者,在实际的工作实践中切身体会到,搭建“文艺场域”是新大众文艺实践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大众文艺这一自下而上的文艺现象脱胎于民间土壤和大众群体,既体现出十足的活力和创造性,也更加依赖专业的指导、资金的支持和媒介的宣传。由上述诸种因素所组成的强有力的“文艺场域”,为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了内驱力,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进入普通读者和观众视野的必要条件。而新工人文学小组之所以在近年来取得显著成绩,正是因其内在运转机制预先解决了“文艺场域”问题,实现了文艺创作的全流程互动。

很多人容易将专业人士和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割裂开来看,但在实际的运作中,他们是彼此交融的。在北京新工人文学小组,专业的师资队伍夯实了新大众文艺生产的底层支撑。他们不仅要在普通创作者的心目中建立起文学艺术的宏伟殿堂,还教会他们鉴赏该殿堂中一砖一瓦的精妙之处,熟悉搭建殿堂的技法。

早在2014年9月,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的张慧瑜(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作为第一位教师志愿者就来到新工人文学小组授课。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师资队伍迅速壮大。据2024年小组成立十周年统计数据,共有116名教师来皮村授课336余人,迄今该小组的授课人员已达200余人。参与授课的人员主要由三类团体构成:一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员;二是《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作家》《十月》《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北京刊物的主编与编辑;三是袁凌、石一枫、文珍、淡豹、郑在欢、黄灯、西元、魏思孝、蒋在等作家。

授课教师向新工人文学小组成员传授了小说、戏剧、诗歌、书法、电影等文艺领域的最新知识,从而保证了小组成员基本的文艺鉴赏能力和创作技巧。一般来说,专业的师资队伍对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生产至少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首先,师资队伍掌握着系统文艺理论与创作的技法,会向学习者介绍文学文本、短视频、通俗剧本、网络文学等大众文艺样式的创作逻辑,提升创作主体的审美水准。其次,专业师资通过开展创作培训,激发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从自身经验出发寻找创作的素材。最后,专业的师资队伍标准,兼具市场与文化的意识,能够平衡流量的导向与价值的引领,有利于推动大众文艺实现品质跃升。

在文艺场域的日常落地、线下实践以及公共展演等环节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的劳动需求,这部分从事公共文艺服务的人力缺口由公益志愿者来完成。同时,作为民间文艺生产的非市场化资本,社会的爱心资金缓解了场地、物料以及运营等方面的成本压力。志愿者群体与社会爱心团体共同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场域社会化保障体系,维系着场域的常态化运转。

目前来看,新工人文学小组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志愿者管理和运营体系。目前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的,大多为高校在校学生和爱好文学的职场年轻人。他们除了组织每周的讲座,在公众号、小红书等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日常宣传,还负责《新工人文学》杂志的稿件处理,策划一年一度的“劳动者文学杯”写作大赛以及“劳动者的诗与歌”联欢活动等。一个公益组织要维持日常运转,开展文学交流活动,资金支持也必不可少。目前来看,社会捐助成为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活动经费来源。该小组每年发布月捐邀请,月捐金额为每月30元到299元不等,吸引了众多作家、学者以及在校大学生踊跃参与。

张慧瑜曾撰文表示,多年来同工友们的交流,让他深刻感受到文学的社会组织与实践功能,“文学小组的成员借助写作、发表,认识了更多喜欢文学的人,人们以文学的名义讨论家乡、性别、北漂、劳动等话题。文学也是一种能够积淀下来的媒介,一旦变成文字、发表出来,就能够让遥远的人们、未来的人们读到,从而产生深远的回响”。新大众文艺创作者完成了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但是,这些文艺作品最终流向何处,决定了创作者个人潜能能

新大众文艺生产中的
「文艺场域」问题——以新工人文学小组为例
□张猛

否被充分发掘,也决定了文艺创作活动能否持续进行下去。在这一环节,艺术成果转化部门的及时参与,对于文艺生产活动的全流程联动至关重要。以文学创作为例,杂志和出版社编辑对作品的筛选和加工,出版部门的响应与配合以及后续宣传推广营销部门的推广,评论家的及时呼应,在新大众文艺作品的价值筛选中发挥了中介的角色,有力地保障了图书市场上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局面。

在组织志愿者为文学爱好者授课的初期,志愿者老师就为小组成员提供改稿服务,并积极推动作品的出版发表。除小组自办刊物《新工人文学》之外,《人民日报》《北京文学》《十月》《中国作家》以及“单读”“人间”等新媒体平台刊登了他们的作品。很多出版机构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股新大众文艺的浪潮,推出《劳动者的星辰》《我在北京做家政》《嬢嬢勇猛》《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等图书,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编辑出版在新大众文艺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这是由文艺创作的开放性所决定的。被锁在抽屉里的文艺作品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文艺作品,因为它没有进入到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的接受视野。然而,由于普通劳动者原生态文艺作品存在表达碎片化、叙事不成熟等特征,且自身受限于行业壁垒,接触到出版与发表的渠道,他们创作的作品很可能沦为“抽屉文学”。在这一背景之下,专业编辑出版团队依托其专业的审美意识与市场观念,构成了新大众文艺场域内的价值筛选中介,推动民间创作从纯粹私人书写向公共文艺产品转化。

文艺创作是一项高度私人化的活动,它需要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充分激发和调动创作者的灵感、想象力,这可以称之为文艺创作的“独”;但是,文艺创作又是一项典型的社会化活动,创作者才能的发挥、文艺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各个相关环节的相互协调、共同促进,而且,对于从事相对枯燥或消耗大量体力的生产劳动的文艺创作者来说,一个彼此鼓励、帮扶的创作团体也能够激励到创作者本人,形成写作的氛围和场域,这可以称之为文艺创作的“群”。文艺创新从来都不是单一维度的行为,“独”是文艺创新的内核根基,为创作提供原创深度;“群”则是文艺创新的外部养分,为创作者的作品质量和传播力度提供保障。当下我们提倡新大众文艺写作,就需要平衡“独”与“群”的问题,尤其是为群体创作提供完备有效的文艺场域。

最近一段时间,新大众文艺得到了广泛讨论。如何推动新大众文艺实现精品化、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大家聚焦的课题。我想到的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对“文艺场域”问题的重视,充分调动专业师资、志愿者团队、成果落地机构等各个主体和环节的相互协作,营造更加浓郁的创作氛围。有了“文艺场域”各环节的建立和健全,新大众文艺创作才能呈现出更加喜人的发展态势。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第四届北京市文联签约青年评论家)